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孟繁华
著

梦 幻 与 宿 命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孟繁华 著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梦幻与宿命

蓝凤箏 ·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I206.7
M3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孟繁华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9
(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ISBN 7-218-03106-4

I. ①梦…②蓝…

II. 孟…

III. 文学评论-中国-现代

IV. I 206·7

书 名	梦幻与宿命 ——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
作 者	孟繁华 著
责任编辑	黄彦辉
封面设计	舒 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9.25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1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3106-4/I·380
定 价	1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总序

谢冕

这套丛书的几位作者都来自学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获得了很高的学位——丛书中有好多部本身就是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丛书的大部分作者，现在也都在大学或研究部门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套丛书的内容，是围绕着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基点展开的，可以说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畴。因此，要是这套丛书加以概括，指称其为《蓝风筝·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应该是很切题的。既然是学院批评，而且又与“当代”有关，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当然也乐于把话题集中在当代的学院批评精神这一点上。

学院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高等学府，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在全体居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中国，学院这地方相对集中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才，这本身就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旧学也有学院的传统，那是以某一位或数位知名学者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书院制度。在这些书院中，通过那种课徒授业式的讲学活动，以交流学术、传播思想。书院在中国旧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发展中，特别是在倡导独立思想和建立学派方面，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现代意义的学院，源起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它发端于“戊戌变法”而逐渐完善于新文化运动，是现今综合性大学的雏形。

现代的学院是新型的综合性的**高等学府，与世界各国的大学

体制相近。在中国，这种集中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学院，往往是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思想活跃的地方。这里也是产生新思想和新思维的场所，从这里发出的信息，往往能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对社会产生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在大学里酝酿和产生的先进的思想，往往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学院以及学院里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地位，已为近代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实。

中国学院的这种品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魅力的展现。学院的地位和它的实践，昭示着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因而，在学院中形成的思想理念，总是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迅速或缓慢地对社会和人群产生着影响，积极地作用于现实的进步与民智的开发。

在文化未能普及的社会，学院的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人才的相对集中，使这里弥漫着浓厚的投入和参与意识。这种意识以表达广大民众意愿的社会理想为巨大支撑，它保留了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学院意识的成熟性，表现在它与社会盛衰、与民众忧乐的紧密联系上，它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最动人的一道风景。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清楚自己在全体民众和整体文化构成中的这种地位，他们总乐于承载启蒙和代言的重负——当然，是通过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生活在中国具体的环境中，他们有一种被选择的庄严感。这种庄严感诱发并产生了使命意识则是自然而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要求自己的工作有益于人、有益于世，他们有很强烈的社会功利心。在中国，学问从来都不“纯粹”。

学院是切磋学问的地方，当然与外界有不同之处。首先是，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与基于个人的创造性劳作有关——而且这种劳作偏重于精神的和思想的层面。这是一个与外面偏重于务实的世界相对游离的社会。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立的，这里的工作立足于思考的独创性，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掘一

个人的潜力，使每一个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至。这里无保留地鼓励奇思异想和与众不同。

无论是求学还是治学，其核心是探求学理。学院精神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影响，究其实，就在于它的思想理念建立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它不排斥激情，而激情却诞生于冷静的分析，并以坚实的理性为前提。这里所进行的一切工作都面对着具体性，事实和材料无疑是立论的根本。把这推广到治学上面来，则一切的推论或判断都应当是有根据的。不务空谈，严谨求实，是这里不可更易的律则。

学院的基本使命在于发展。它不仅是接受前人的思考成果，而且有责任推广和发展前人的成果。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并非被动地接受，总是追求以自己的加入而使历史丰富。中国学术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接力赛中得到延续。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成员都以能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进入学术的创造性传统而引为荣耀。正是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和所理解的学院精神总与创新有关。说学院是做学问的地方，此话不错。但它是一道鲜活而浩大的长流水，靠的是源头的深远，也靠的是加入者的鲜活的输送。

回到这套丛书的话题上面来，这里集聚的几本著作涉及的内容，均立足于20世纪、特别关注于本世纪下半叶以迄于今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潮的研究观察。既然是以当代文学的观察为重点，这里当然充盈着对于现实的关注和激情，为它取得的成就，也为它曾有的失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本世纪后半叶所经历的挫折，为近现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时届世纪末年，文学则有亟待克服的积重和新的期待。文学需要回应生活提问的也更多。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方面，文学研究需要对以往的累积作出有效的清理，另一方面，则要以更多的毅力和锐气面对新的挑战。这无疑是当代的学院批评的严重

的任务。

本丛书的作者大体总与北京大学有关，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获得过北大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是很有创造力和锐气的新一代学者。奚密教授情况略有不同，她是我的朋友，现在就职于戴维斯加州大学。她是中国当代新诗热心的研究者和权威的诠释者，她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国内和海外学界的公认。她的加盟为本丛书生色不少，在此，我谨向奚密教授致谢。本丛书的大量组织工作是程文超做的，我也向他表示谢意。当然，我还要代表全体作者向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丛书的责任编辑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9年2月16日，旧历己卯年正月初一，于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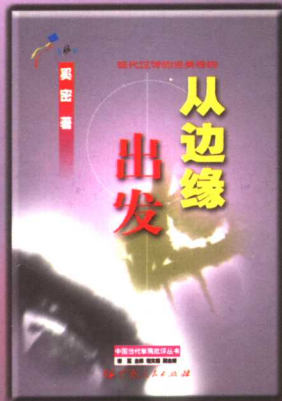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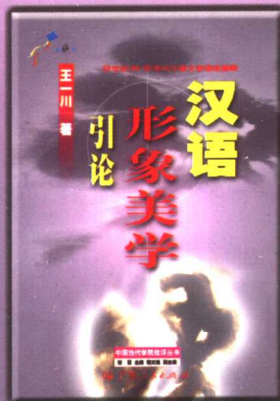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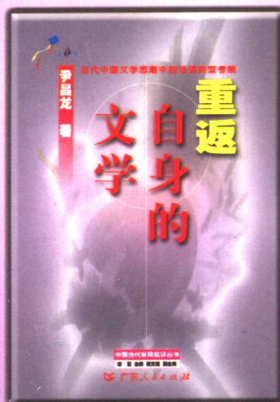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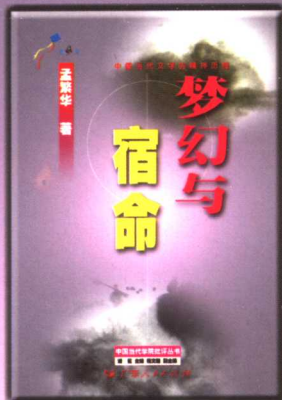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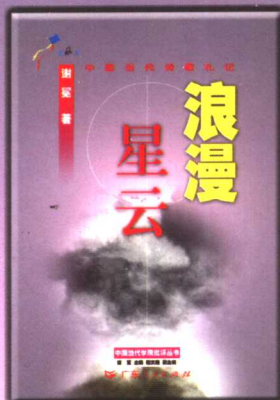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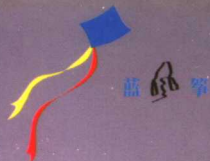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孟繁华，男，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新时期小说与诗歌十讲》（1986年）、《叙事的艺术》（1989年）、《文学的新现实》（评论集1989年）、《众神狂欢》（1997年）、《1978：激情岁月》（1998年）、《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十卷，与谢冕共同主编，1997年）、《百年中国文学总序》（十一卷，与谢冕共同主编，1998年）、以及论文、评论百余篇。现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文化的评论与研究。

中国当代学院批评丛书

谢冕 主编 程文超 副主编



目 录

导论	(1)
一、儒家思想与文人心态的基本矛盾	(6)
二、思想情感方式的断裂及再造	(16)
三、知识分子走向民众的精神地位	(25)
第一章 浪漫时代的精神向往	(37)
一、追随大众的乡村之恋	(41)
二、拒斥城市的道德理想	(51)
三、精神解放的示喻	(62)
四、暴力崇尚与意力叙事	(76)
五、群体精神的峰巅体验	(91)
第二章 “一体化”时代的精神矛盾	(108)
一、精神蜕变的自我苦斗	(112)
二、心灵孤旅：抒情在别处	(123)
三、“突围”欲望及迫力下的回归	(135)
第三章 延宕历史的精神重建	(151)
一、被追怀的精神传统	(153)
二、想象“人”的苍凉之美	(165)
三、反抗绝望：“自我”的复活	(179)
四、启蒙角色再定位	(195)
五、忏悔中的道义情怀	(210)

第四章 体验自由与精神跌落·····	(228)
一、闲适和静观·····	(234)
二、自弃与幻灭·····	(243)
三、粗陋的流行·····	(254)
四、体验自由和“精神圣战”·····	(265)
结语 走向独立的精神之路·····	(279)
后记·····	(286)

导 论

当代中国文学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半个世纪的风云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显得格外漫长。当代中国文学作为社会中心话语的表意形式，作为时代敏感和倍受关注的领域，更是异常复杂而清晰地转述了半个世纪来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同时，那里更明确地蕴含着当代中国作家复杂的心灵世界和精神向往的全部痛苦与欢愉，追求与寄托，蕴含着他们与社会生活时而适应快乐，时而压抑焦虑，时而有了家园归宿般的平静，时而又迷茫丛生般的沮丧等复杂的心态。社会历史处境决定了作家心态的生成和发展，也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向度，它们互为表里，相互规约。因此，从作家心态的曲折变化入手，梳理并描述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历程，总结文学与社会生活、与中心话语、与文化历史遗传的诸种关系，就是本文的出发点。多样的心态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无可置疑地构成了作家的心灵史，但我们毕竟没有可能无一遗漏地“如实”地叙述它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选择与局限已先于我们而存在。但任何概括和描述都将连同作者的“偏见”一起写进本文，这是我们的“宿命”。在这样的认识中，我们将着重从社会中心话语（制度化规约）和历史精神遗传（非制度化规约）两个方面来讨论作家心态的发展变化，从而实现当代中国作家心态的“如实”探讨。

我们都注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中心话语的影响是无处不在

的，这是我们现实的处境，任何人的行为方式或心理状态无不与这一处境密切相关。甚至人们最生活化的服饰或称谓的变化，都无不体现出意识形态的紧张或开放的变迁，对于极其敏感和倍受重视的文学创作来说自是不言而喻。意识形态是历史精神的权威发出者或阐释者，或者说，历史精神主要是由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它具有“制度化”的功能，它所倡导和抵制的不允许无视和超越，它无处不在的制约力使每个作家必须认真考虑并实行。考察近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每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现象，作家或作品几乎都与历史精神结下了不解之缘，更何况许多思潮、现象或作品本身就来自于对历史精神的阐释或转述。

但是，作家心态或文学创作作为人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它又不仅仅表现为受历史精神的鼓励或制约，刺激或抑制。除了这些自身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之外，它与“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自我塑造、表达方式等又息息相关。这也是本文立论的出发点之一。“非制度化”的文化遗传，犹如对原型批评给以很大影响的列维—布留尔所描述的，它是一种“集体表象”。“所谓集体表象，如果只从大体上下定义，不深入其细节问题，则可根据所与社会集体的全部成员所共有的下列特征来加以识别：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1]荣格发展了布留尔的理论，并将自己的发展命名为“集体无意识”。在荣格看来，“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征，作者愿称其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中获得，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作者将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2]。荣格的这一发现对解说人类的文化心理遗传无疑提供了新的视野，但他认为杰出的艺术创造都源于神话与集体无意识，则使他

又临近了绝对性的边缘，即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

作家心态一般来说是由相对稳定和相对活跃的两部分构成。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基本可看做是来自于民族的文化遗传，它是“非制度化”的产物，它不受外部力量的控制和干预，比如价值取向、思想情感方式、道德标准等，常常构成人的内在的“文化指令”，每个民族几乎都可以追根溯源找出这一“文化指令”的原型。它既属于“个人心理性质的文化”，同时也属于“集团的超个人性质的文化”。^[3]这一原型文化的演生和发展构成了不同民族文化特征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国“士”文化中的使命意识、忧患情怀、依附性格、尊经法古、重义轻利等，虽经近、现代“文化革命”的巨大冲击甚至批判，但至今仍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构成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它潜在的影响和作用依然存在。这些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遗传一旦在社会动荡、转型、倾斜发生时，知识分子便会产生心理的紧张或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无意识”是存在的。

但原型文化既然有一个不断播散的过程，那么它就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精神实体。在播散的过程中，一部分被扬弃挥发掉而丧失了延续的可能，被肯定认同的新的基因替代并加入了播散过程。因此，文化遗传也始终处于不断改造、创造的运动之中。新的文化基因是活跃的，同时也是不稳定的，在播散过程中既可能被接受而得以延续，亦可能很快就遭到淘汰。历史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取舍，并在极大的程度上左右着作家的态度。作家心态中较活跃的相对不稳定的因素，基本来自于历史精神的感召和作家主体的积极选择或被动接受。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后者也许更为重要，现实迫使他们对于历史精神作出应有的回应，不同的回应方式决定了他们的表达方式、精神地位、艺术生命甚至整个人生的命运。因此在当代中国，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关

系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为主，这是一种传统的但也是较成熟的批评方法之一，长期被运用于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但长期以来，它曾不适当地被尊为权威的甚至是惟一具有“合法性”地位的研究方法。而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的庸俗化倾向日益严重而成为“庸俗的社会历史批评”，并成为历次批判运动的主要工具和武器。一方面，社会历史批评被“庸俗化”多年的“劣迹”搞得声名狼藉，人们一提起它首先想到的是它多年来被庸俗化了的那副面孔，因此，十多年来在各种新方法纷纷被应用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同时，对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也进行了一次无情的清算。但这仅仅是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单一的方法已无法适应日益多样的文学现象和对文学史研究日益多样化要求的需要。因此，它遭到研究者的厌倦或抛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情绪化的驱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得起追问则大可怀疑，它的生命力和有效性是否真的已经终结同样值得认真思考。

事实上，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在批判、解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同时，也在不同层面汲取了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充实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新历史主义在批判、修正了历史主义、形式主义和历史编纂学之后，特别提出了对阐释语境的理解和分析。在研究“写作语境”、“接受语境”、“批评语境”^[4]的基础上，新历史主义强调“结合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去解释作品与社会互相推动的过程”^[5]。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汤姆金斯也认为，文学价值的判断永远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对读什么样的作品，写什么样的作品，人们一直不断地进行选择，因此对价值的判断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的兴趣爱好，是在一种强有力的价值体系内产生的，所以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必须是依照历史条件

的变化决定的。就是说，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必须把它重新置于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了解它产生和形成的条件与方式，了解它怎样形成自身的特点，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6]这些看法不难看出社会历史批评的某些影响。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虽然批判了正统的文艺与社会关系说，但他们立论的根据仍然没有超出社会历史范畴；弗罗姆对人的解放、自由、异化的研究，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人的“单向度”的研究等“社会批判理论”，都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并获得结论的。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学理论是由特定历史阶段决定的，他甚至不无偏执地认为，一切文学批评都是政治批评。

在德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赫·绍伊尔在《文学史写作问题》^[7]一文中，考察了自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诸问题。其中方法的问题仍是中心话题。他论证分析了自1776年赫尔德的第一部文集《论近代德国文学》的“整体图像”说开始，对施莱格尔兄弟的“浪漫美学”、路德维希的“祖国文学史”、格尔维努斯的“时代史”，到19世纪的“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到20世纪的“作为精神科学的文学史”、“文本批评法”、“阐释艺术”等，逐一作了评述或批判，但他在展望未来的写作时仍说：“文学史的写作应当在生产和作用史的广阔视野中观照文学作品，应当架设一座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它应当把文学既看作是一种审美构造，又理解为一种历史产物。文学史只能构建一种框架，设计出一幅拼镶画，还有许多色彩斑斓的石头应当填补到这幅画中去。这种暂时性和不完整性是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无法避免的。”^[8]这些看法无疑都在说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补充或完善了许多新的方法论，它并没有因“庸俗社会学”的泛滥而失去生命力和有效性。同样，这一论证也并不意味

着拒斥其他方法的合理性和创造意义，愚蠢地重新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定为一尊。需要说明的恰恰是另一面，当我决定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研究当代作家心态与历史精神的复杂关系时，必须同时借助于其他新方法的帮助或启发。方法论的互补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一、儒家理想与文人心态的基本矛盾

1. 儒家理想与文人心态模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绵延不绝两千余年，以主流的形式对后世尤其对传统文人和近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它的博大精深显示了东方的智慧，以其独特性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发出悠长而久远的回响。

儒家思想自创立始，便为传统文人设计了理想的人生道路，这一理想的设计成为几十代传统文人终生向往与奋斗的目标，它的实现与否标示了人生的成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在儒家看来，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最理想的人生选择，也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9]只有治国平天下“应帝王”、“作宰辅”才是人生正道。而“学稼”、“学为圃”的樊迟则被孔子斥为没有出息的“小人”。

要实现这一理想，通过仕途跻身于官僚集团是惟一的通道，“士之仕也，犹如农夫之耕也”。“学而优则仕”是两千余年传统文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历代官制经由任命、“辟地”、“胜敌”、“九品中正制”等各种形式逐渐过渡到隋唐以降的“试策”取士和“科举取士”，积极从政的传统文人便纷纷踏上了通往理想的狭窄道路，一个个儒生满怀神圣与建功立业的梦幻，头戴方巾、